

# 从清早期武器装备看中原文化对其影响

Cultural Influences of Zhongyuan on Early Qing-dynasty Armaments

苏阳 李理

*Su Yang Li L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从清早期武器装备看中原文化对其影响

## Cultural Influences of Zhongyuan on Early Qing-dynasty Armaments

苏阳 李理

Su Yang Li Li

### 内容提要:

清王朝发迹于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在其建国以及满族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曾受到大明王朝和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初宫廷及民间所使用的各类器物、服饰和生产、生活用具，有许多即直接来自明朝，蕴涵着中原文化风貌。从清早期武器、装备等传世实物来看，它们有的为明朝所赐，有的通过战争缴获，有的是仿照明朝样式而生产，有的则是将明朝旧有器物创新使用，用于军事战争之中，总体上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明的继承与发扬。

### 关键词:

明代文物 清早期文物 武器装备 文化传承

###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originated from the Liaodong peninsula north of the Shanhaiguan pass in the Great Wall.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and of the formation of its ethnic community, the Manchu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ing (1368-1644) dynastic culture as well as, more generally, the culture of Zhongyuan. There were countless ties between the Manchu community and the Ming territory in terms of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y, and culture. Many of the objects, costumes, production tools, and daily utensils used by the Qing court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during the period show legacie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substantial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Zhongyuan. Early Qing armaments were partly gifts granted by the Ming rulers, partly spoils of war, or new productions in the Ming style, while there were also creative adaptations of object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for military campaigns. In general, these objects reflect ethnic groups' inheritance and upgrade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Zhongyuan.

### KEYWORDS:

Ming-dynasty cultural heritage, early Qing cultural heritage, armaments, cultural inheritance

后金（清）政权崛起于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相对于封建制度完善、物质文明发达的明王朝来说，女真（满洲）社会的经济状况相对落后，人们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武器与军事装备都较为原始和简陋，体现出东北边疆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存在着差异性。

尽管如此，后金（清）政权还是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由偏居一隅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成功起步，先是击败数十万明军，占领了辽东地区，进而控制了整个东北；而后又于顺治元年（1644年）出兵入关，挺进中原，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的强大帝国。其中的原因，除了女真（满洲）民族以新生力量自身具有的一些优势，另外还与其善于吸收和学习外族文化，积极借鉴并使用其他民族的传统器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后金（清）朝早期，特别是其进入辽东地区之前，女真（满洲）人所使用的武器以本族所擅长的弓箭最具杀伤力。除此之外，其他金属类武器与军事装备则大多出自于明朝，通过战争掠夺、商品贸易、仿制生产等多种形式而掌握。

至今，从清初时期传世的各类武器与军事装备文物来看，其绝大多数都具有明式特点，蕴含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本文以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等博物馆所收藏的清朝武器与军事装备为例，具体研究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来发掘明清两朝之间的传承联系，展示中原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其意义。

## 一 清早期对明式冷、热兵器的利用

女真（满洲）发迹于辽东边墙以外的深山之中，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后金国家建立，女真地区仍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晚期，国中采用军事民主体制，社会经济较为落后，人们使用的金属类产品，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武器以及军事装备，均需要从明朝、朝鲜方面获得，获取的手段一是通过商品贸易交换，二是通过战争而直接从对方手中获得。

从传世实物来看，女真（满洲）人当时所使用的各类金属类器物，都带有鲜明的明式特征，如女真（满洲）人所使用宝剑、腰刀、各式长枪以及火銃、火枪、火炮、火箭、火蒺藜等各类火器，有许多是产自明朝，器物造型和其上装饰的图案纹饰，亦多为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符号，带有强烈的明式特点与文化内涵。

目前，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中，尚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清初武器类文物。根据史籍资料和传世实物来分析，它们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明朝宫廷直接赏赐，二是由战争、抢掠而间接获得，三是后金（清）国内工匠依据明式器物样式，在东北地区各地生产制造。

以下，即根据一些博物馆所收藏的清早期冷、热兵器予以研讨：

其一，清太祖努尔哈赤宝剑〔图1、图2〕。

此剑是目前已知极少数努尔哈赤传世实物之一，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藏品。

剑全长80.5厘米，刃长58.3厘米、宽3.1厘米，柄长19厘米、首宽8.3厘米，鐔长3.2厘米、宽9.9厘米，为钢、铜、鲨鱼皮等复合材料制成。剑身钢制，双刃平钝。剑柄为铜制，柄首呈海棠形，开光内镌刻天官、鹿、鹤图案，柄部嵌以黑牛角，剑鐔为铜制，中间开光内镌有玉兔、云纹，鐔两端似龙首形。剑鞘外包铜皮，有7道铜箍，中间两侧另包以鲨鱼皮，并镶嵌螭虎、花卉纹鎏金铜片。从装饰图案看，有“加官进禄”、“玉兔呈祥”



图1 努尔哈赤御用宝剑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2 努尔哈赤御用宝剑（局部）剑柄



图3 皇太极御用腰刀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4 皇太极御用腰刀（局部）刀把及鐔部

等寓意。

清乾隆年间曾为此剑佩以皮条，用汉、满两体文字书写“太祖高皇帝御用剑一把，原在盛京尊藏”等字样。据专家考证，该剑应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敕封努尔哈赤“龙虎将军”之时所赐佩剑。

其二，清太宗皇太极御用腰刀〔图3、图4〕。

此刀为清太宗皇太极御用之物，是其征战沙场的实用兵器，为目前世界上极少数皇太极传世实物之一，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极为重要。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藏品。

此刀制于后金天聪至清崇德年间（1627～1643年），由钢、铜、鲨鱼皮等复合材料制成。全长94.5厘米，刀长75厘米、宽4厘米、厚0.6厘米，柄长15厘米，鐔长9厘米、宽8.5厘米，鞘长77.8厘米、宽5.4厘米、厚1.3厘米。刀身以优质钢制成，外形似扑刀，刀刃锋利，刀身铸有两道血库；刀柄用皮条缠绕，柄首及鐔部有镂空铜鎏金花纹，制作精细；鞘为木制，外包鲨鱼皮，鞘外有镂空铜鎏金花卉纹横箍4道，中间两道横箍略窄，箍上有圆孔，用以系带。此刀附有乾隆年间所制皮条，上书满汉两体文字“太宗文皇帝御用腰刀一把，原在盛京尊藏”〔图5、图6〕。



图5 明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军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6 明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军刀（局部）刀把及鐔部，刀把编线与皇太极腰刀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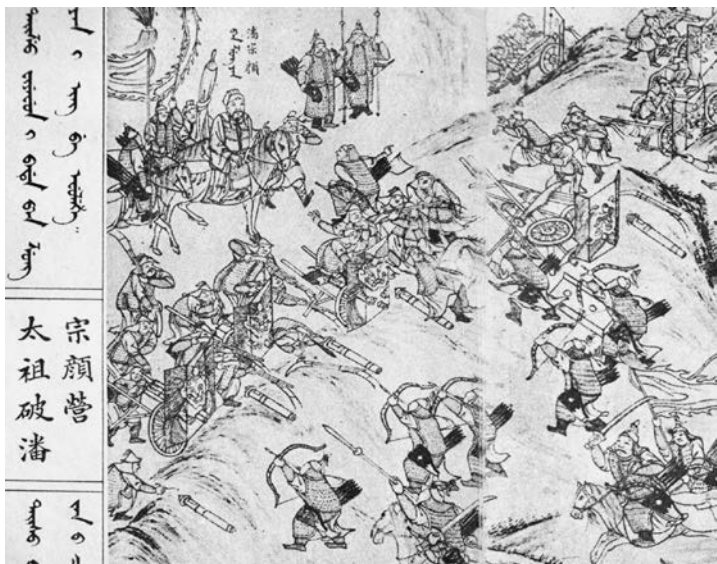


图7 清《太祖实录战图》之《太祖破潘宗颜营》局部，描绘明军使用大量火枪、火炮，被八旗官兵悉数缴获



图8 明铜铤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9 清铜铤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军刀。<sup>1</sup> 这把军刀从外形和武器气息，都与沈阳故宫所藏皇太极御用腰刀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如刀刃的长度，刀锋的曲线，刀背部的两道血槽，刀柄部造型与装饰线绳等，甚至两把腰刀在刀把的编线方式上，也几乎完全一致。这反映出清初时期皇帝、八旗贵族所使用的武器的确是出自同一时期的工艺，具有相同的制作特征和文物内涵。

其三，明末、清初各类火器〔图7～图12〕。

女真（满洲）族为擅长狩猎的民族，其使用的武器以弓箭为主，此外还有一些刀枪等冷兵器。后金建国后，随着与明朝公开宣战，进攻辽东边内地区，女真人开始从明军手中获取武器。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明朝组织数十万大军，携带火枪、火炮等新式火器，分路向赫图阿拉城进攻，

<sup>1</sup>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图 10 清木托交枪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 11 明小铁炮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 12 清小铁炮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企图一举消灭新生的后金势力。努尔哈赤临危不乱，部署大小贝勒率八旗军与明军展开殊死战斗，最终消灭多路明军，缴获其所带的大量火器。从此，后金（清）军亦开始使用火器。至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随着汉军归附人数日众，从辽西地区缴获的火器也不断增多，明式火器在后金（清）对外战争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组建起以汉人为主的乌真超哈（重兵，火器）营；崇德二年（1637年），按满蒙旗制建立汉军二旗，两年后又扩充为四旗，并于崇德七年（1642年）正式建立了汉军八旗。从清朝军事史来看，汉军八旗的主要技能即使用火器，以火炮、火枪、明式武器等进攻各地明军，在夺取辽西和关内各地诸城中，火器部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类明末、清初时期的器物大致有火铳、火枪、火炮、火箭、火蒺藜（火雷）等器物。从沈阳故宫现藏明清火器来看，它们的外观和造型几乎完全一样，而且与清《太祖实录战图》中所绘的明式火枪、火炮也非常相像，反映了清初八旗部队对明式火器的传承与使用。

## 二 清早期对明军事装备器物的借鉴与创新

女真（满洲）民族诞生于东北边疆的白山黑水，关外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造就了该民族具有一种宽容、豁达与包容、吸纳的心态。体现在对外交往和学习方面，他们往往是来者不拒，凡是其他民族优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传承，即愿意吸收和接受，转而为自己所用。正因为如此，女真（满洲）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仅完成了本民族统一，创建了新兴国家，占据东北大部分土地，更

于 1644 年挺进关内，实现了入主中原、一统中国的梦想。

女真（满洲）民族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由一个偏居一隅的弱小少数民族政权，演化为掌握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与其统治核心成员积极学习、善于借鉴、努力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史实情况看，女真（满洲）人从起兵之初，即开始借用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乃至各类器物，为本族所用，并努力创造新的使用形式，使它们更具使用价值。比较我们所熟知的女真（满洲）对明朝官制服饰的学习与改进，对明式武器装备、马具的使用，对明朝宫廷和传统器物的改良与使用等，都是在充分吸收明朝实



图 13 清《太祖实录战图》之《太祖初兴图论》局部，描绘努尔哈赤身着铠甲形象



图 14 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甲胄  
乾隆朝复制，故宫博物院藏



图 15 清太宗皇太极御用盔甲  
乾隆朝复制，故宫博物院藏

物基础上，重新创新和改造再继续使用的，使这些器物在后金（清）朝政治、军事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以下，以清初时期一些军事装备器物为例，研讨其与明朝的相关联系：

其一，明清两朝甲胄〔图 13〕。

熟悉清朝开国史事的人都知道，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其军事势力、物质基础都非常薄弱，史书记载他当时只有“遗甲十三副”。限于其时女真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经济基础和生产工艺均较为落后。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建州左卫的部落小酋长，他所拥有的甲胄自不可能是女真人自己生产，而应是明朝宫廷所赐之物。因此清朝皇帝所使用的甲胄，从开始之初即与“天国”明朝有着不解之缘。

从清初时期所形成的《太祖实录战图》来看，当时努尔哈赤已经穿着形制比较规范的甲胄，与其时的明朝甲胄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肯定，清早期的一些甲胄和官服大多为仿制明式，或者就是以缴获的明军甲胄而改制。

清太祖、太宗甲胄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它们又称为“后金汗努尔哈赤甲胄”和“皇太极甲胄”。据专家研究，院内所藏这两套甲胄应为乾隆朝所复制。从清初开国至乾隆朝，由于时间已经过去 150 余年，开国时期一些文物有的已经破损，故高宗传旨对先帝甲胄、武备等遗物进行复制，并拴系鹿皮条或粘贴黄签，用以标识这些珍贵的文物〔图 14〕。

清太祖所用之甲，通体为坎肩式对襟大褂（或曰长袍），绿地红蕃莲闪缎面，面上均匀地布满镀银帽钉，青缎缘，棕色布衬里再缀以精铁片。两袖从肩部至袖口，完全用窄条铁片连缀而成，使之弯曲便当，伸展自如。袖上部安置扣袷，穿着后与甲肩部相连，解装时可取下单独收存。另有护腋（亦称遮窝）一副，铁片夹在闪缎面与棕布里之间。甲与两袖合计重约 213 斤。

清太祖所用之胄，炼铁为之，前后梁、护额等均鍍金云龙纹。护项、护耳与甲一样，亦为绿地红蕃莲闪缎面，鹿皮里，内敷以铁片。胄重约 25 斤〔图 15〕。



图 16 明铁胄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 17 清铁胄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 18 大金天命年铸云板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 19 清顺治年间铸造的铁云板  
现悬挂于北京法源寺院中

清太宗所用之甲，宝石蓝云缎面，分上衣和下裳。衣前后绣五彩云龙各一，内敷铁片，护腋、前裆（亦称前遮缝）、左裆（亦称左遮缝）均彩绣火珠，周身彩绣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罐）、金鱼、盘长（肠）等八吉祥物（亦称八宝）。两袖以细窄铁叶缀连而成，着装后用绳扣与甲系紧。裳，又曰裙，分左右两肩缎面，以镀银铜帽钉和彩绣八宝相隔，列明铁叶五重，每重 38 片，左右总计 380 片，甲与两袖总计约 214 斤。

清太宗所用之胄，炼铁为之，顶盘、前后梁、护额等处鍍金云龙纹，其前梁正中有镂空金龙圆征。护项、护耳、护颈为宝蓝云缎面彩五彩火焰，黄鹿皮里，青缎缘，内俱敷铁叶片。重约 30 斤〔图 16、图 17〕。

女真（满洲）人像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一样，习惯采用髡发制。所戴冠帽冬季以野兽皮毛为多，夏季以藤草编制的凉帽为多。原来进入辽东地区之前少有冶炼生产，故也无金属制头盔。

这一现象在其与明朝作战，特别是进入辽东地区后，发生较大改变。随着缴获明军各式金属头盔，女真（满洲）贵族也开始盛行铁质头盔，并一直在八旗部队中沿用。

清初时期所使用的金属头盔，一方面是通过与明军交战缴获而得；另一方面则由辽南地区的铁匠按明式直接打制。因此从清初时期开始，八旗将士所用的金属头盔基本采用明式，材质有铁质、合金质等。这一点从清《太祖实录战图》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图像佐证。

从沈阳故宫现藏明清时期铁质头盔来看，两者造型十分相像，有时也较难分辨，反映了明清器物一脉相承的共同特点。

其二，传统云板与“大金天命年铸云板”〔图 18、19〕。

云板原为中原地区传统的佛教、道教信众的日常用具，悬挂于佛教寺庙或道教祠观中，在信众祈祷、集会或饮食就餐时敲击做声，以召众人。中原地区的云板有木质、铁质、铜质等多种形式，样式有一侧云头、两侧云头等多种款式。这一器物在中原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均有使用，反映了一种器物传承和使用的复杂性。

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军占据辽东后，很快将云板这一宗教器具转用于战争报警和宫廷传令之器，充分发挥了特殊器物的使用功能。根据清朝官方文献记载，云板用于军事设备时，主要用于边关传递信息，由守卫边疆台堡的官兵执而鸣击，每当发现有敌军来袭时，要按照其人数多寡，采用快慢不同的方式进行报警。

如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向前线守卫各台站官兵降谕：“……无论何台人发现敌至，即行放炮、举纛、击牌（板）。不论边外、边内，见敌一二百，则举一纛、放一炮、缓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一号烟。倘有一二千人，则举二纛、放二炮、急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二号烟。倘有万余人，则纛尽举、炮连放、云牌（板）连击；夜间，则烽火全燃。见敌兵进入之时，当即向各台人报警，各台人均照首先受敌之台人举纛、放炮、击云牌（板）和燃烽火，以使国人知之。报警一次后，仍未见敌之台人，勿再妄行放炮。其见敌之台人，仍须放炮、击牌（板）勿绝，夜则燃烽火。敌进何处，凡所见之台人，亦放炮以应，我军可闻炮声往寻之。不然，胡乱放炮，则难知敌在何处。不举纛、不击云牌（板）、台人不放炮，仅由城堡之炮酌放之，闻其声岂不以为乱战耶？”<sup>1</sup>

另外后金时期铸造的云板，还被努尔哈赤应用于宫廷传令，成为宫中重要的传讯器具。

如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努尔哈赤定巴牙喇（护卫亲兵）值班制度，规定：“巴牙喇之值班人等，待门开后始得入坐。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内，守门人亦不得入内。（值班人等）坐于门，鸣板召之，乃入。鸣板毕，即出……”<sup>2</sup>说明此时云板已明确用于内廷，成为汗王使用的器物。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四月迁都沈阳后又规定，因国中时局紧迫，“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之后，即在汗宫门口悬挂云板、锣、鼓等物<sup>3</sup>。

沈阳故宫现藏云板，为国家一级品文物。此件云板以生铁一次铸造而成，全高55.5厘米，上宽36厘米，下宽44.5厘米，厚1.2厘米，共重12.5千克。云板中间的板身呈长条形，上下部均铸成云朵形状，上部云头略窄，下部云头略宽，表面制有微凸的卷草花纹，云头顶部各铸有一朵凸起的团花，下部云朵中央制一大朵团花，花卉中心铸成圆形凸点，为敲击之用，凸点周围饰以层层花瓣。板身正面的中间部位铸有汉文，右侧为楷书双勾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文字之下单铸楷书阳文“城”字。云板上部中间制有一圆孔，为当时系绳悬挂所用。

其三，明宫驾牌与清初信牌、印牌。

出廓璧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玉器造型之一，在两汉时期颇为盛行，其后这种出廓璧造型在历代器物中多有应用。至元朝，宫廷和地方官府往往将其制成金属牌子，由信使和禁卫人员使用，以用为凭证信物。

明朝，宫廷之中曾大量制作铜制马牌、信牌，由宫内侍卫或宦官使用，用作出入宫廷门禁的凭证。这类文物被较多保留下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单位。

清朝开国时期，利用这种明式马牌造型，转用松木等材质，制成较大体量的信牌与印牌，专门用于战争传信，或将汗王（皇帝）谕旨张贴在木牌之上，或将木牌刻成皇帝玺印印面，由御前侍卫、亲兵所持，往来于宫廷和各地战场，及时传达汗（皇帝）的命令。

当时，清朝宫廷曾大批制造和使用这类木制信牌和印牌。现在在沈阳故宫所藏信牌、印牌仍有五六百面之多，它们总体上可分为三种，分别是“蒙文信牌”、“皇帝之宝印牌”和“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蒙文信牌、

<sup>1</sup> 《满文老档》上，第26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中华书局。

<sup>2</sup> 《满文老档》上，第49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中华书局。

<sup>3</sup> 《满文老档》上，第63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中华书局。



图 20 明代驾牌之一  
正面及背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 21 明代驾牌之二  
正面及背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皇帝之宝印牌制造于后金天聪年间，宽温仁圣信牌制造于清崇德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沈阳故宫从三类木牌中各选一面作为典型器物，经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审核，将其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明朝宫廷的驾牌〔图 20、图 21〕传世较多，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之中。此类驾牌为铜质或铁质铸造而成，它们做工较细，文字图案精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驾牌，高约 9.5 至 9.7 厘米，牌面直径约 7 厘米，牌顶部有圆形穿孔，牌首为倒置荷叶形，内刻有莲瓣状花纹；牌面为满月圆形，正面中央铸有篆书阳文大字“驾牌”，左侧铸楷书阳文小字“出京不用”，有的在牌右侧铸有楷书阳文小字“岁字陆佰伍拾号”，有的铸字为“龙字伍千壹佰贰拾壹号”；驾牌背面铸有楷书阳文小字 5 行：“御马监随驾（官）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sup>1</sup>

从明朝宫廷驾牌与清初信牌、印牌这两类器物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清朝宫廷对明朝器物的模仿，也可了解到女真（满洲）人擅于创造，积极创新的新思维与新观念。

后金蒙文信牌〔图 22〕，此类信牌共有 30 余面。它们做工较粗，均为松木质，通高 31.5 厘米，圆径 21.4 厘米，厚 2.7 厘米。它们专用于大臣、侍卫往来蒙古地方，牌上粘贴汗王诏书，命沿途地方为信使提供驿马和粮草，信使则不得无故侵害地方居民。牌正面阴刻一行蒙古文字，汉译为“天聪汗之诏”；牌背面制成圆形凹槽，用来粘贴汗王圣谕。现在牌背面槽内贴粘圆形高丽纸，纸面钤有无圈点满文印一方，印模长宽均为 12 厘米，印边宽 1 厘米，印文自左至右为 6 行满文，其汉译为“天命金国汗之宝”；在印模的纸面，另由毛笔自左至右竖书蒙文 12 行，汉译为：“汗诏曰：为方便行政官员，凡入甲喇，可乘该甲喇之役马，该甲喇可供其肉食和住宿。惟白天在甲喇中不可食肉；出甲喇，则不许乘该甲喇之役马，也不许食该甲喇之肉，违者论罪。不持信牌者，可不供马匹及肉食。如强索供给，即逮捕送来。为国家办事持信牌的官吏，无论行至何处，该地均应供给役马及肉食。天聪汗再次行文，春正月。”该信牌面刻“天聪”年号，背帖“天命”印文，说明在皇太极执政初期尚在使用“天命汗”之印。

后金皇帝之宝印牌〔图 23〕，此类印牌亦为松杂木所制，通高 29.3 厘米，圆径 22.1 厘米，厚 1.7 厘米。

1 文物现藏国家博物馆，见〔韩〕《中国皇帝遗物选展览》展览图录，2000 年。

印牌正面中央刻有方形凹槽，槽内雕刻描金阳文3行，为“皇帝之宝”满、汉、蒙三体文字；印牌背面中央刻方形凹槽，内贴方形高丽纸，纸面钤无圈点满文篆书印文，自左至右4行6字，汉译为“金国汗之宝”。实际使用时，可由大臣、侍卫和八旗官兵所执，用以临时传达汗王口谕或其他战场信息。在战争中归顺的汉族官员或村中百姓，亦可通过接受并展示手中印牌，而避免其他女真（满洲）官兵抢掠。牌正面阳刻满、蒙、汉三体文字“皇帝之宝”，牌背面制成方框形凹槽，用以粘贴满文篆刻的汗王玺印印模。此类木牌做工粗糙，少数外表形制极不规整，有明显的斧凿刀削之痕。该类印牌是沈阳故宫所藏三类印信牌中最的一种，共约530面。

清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图24〕，此类信牌为椴木质，通高30.8厘米，圆径21.8厘米，厚2.2厘米。现在我院共藏有100余面此类信牌。该牌数量较多，做工细致，造型规矩，牌顶部穿孔皆系有长绳，与皮质牌套相连接；牌套表面彩绘有云龙赶珠纹和海水江崖图案。该牌正面阴刻有满、蒙、汉三体文字“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字样，因年款明确且满文为加圆点满文，属于十分珍贵的清初宫廷实用器物。“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成为八旗官兵手持牌面，直接传达皇帝旨意的凭信之物。木牌上部雕刻成云头形，边框涂朱红色，蓝池内雕有描金赶珠龙纹，龙身之下为墨绿色海浪纹；牌面边框涂成墨绿色，总体上显得粗犷简陋，朴实无华。

沈阳故宫所藏清初时期的信牌、印牌，它们虽是由产自东北山区的松木、椴木等制作，其造型却是源自中原。至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有多面明朝宫廷的侍卫驾牌。它们的外形与清初信牌、印牌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材质为铜铸。

从以上所展示的清早期武器装备类文物来看，它们大多保留着明朝文物——中原文化的特征，如器物造型、图案纹饰或制造工艺等，反映出清朝器物对明式器物的模仿与传承。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面对数千年的中原文化，崛起于东部、北部、西部、南部的新生少数民族，都会被其优秀的文化所吸引，他们通过主动或被动地模仿与吸收，而使自身得以提高和发展，建立起本族的优秀文化与文明。与之同时，随着各少数民族不断涌入中原地区，也会为其带来新的观念、新的血液与新的创造。中华民族正是在各少数民族的持续加入与推动下，一步步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优秀，最终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

[作者单位：沈阳故宫博物院]



图22 后金蒙文信牌  
正面及背面，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23 后金满蒙汉文“皇帝之宝”印牌  
正面及背面，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24 清满汉蒙文“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正面及皮套，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